

## 壹、前言

當代中國大乘佛學研究，可以說是研究人口眾多、學術資源豐富，因此研究成果堪稱豐碩。但是，純粹從哲學理論的研究進路來進行的佛學研究，卻極有努力空間。關鍵即在，作為哲學理論一支的佛教哲學，由於在哲學研究方法的定義上尚充滿著衝突與歧義，因此影響了佛教思想以哲學理論形式表達時的準確焦點。也就是說，從哲學領域研究佛學，仍然充滿了問題意識的歧義與理解的差異，例如：佛學是不是哲學？佛教有沒有形上學？漢傳佛教有沒有研究的價值？佛教有沒有知識論？大乘佛經是不是佛說法？三教辯證的優劣勝敗？等等諸多問題，都是哲學學術界尚在爭議之議題，當然也就在爭議之際觀點不一。

中國大乘佛學，以漢譯經典為對象，在中國本土上進行了一千多年的消化與創造，所產生的理論內涵，堪稱廣大精微。當時序進入二十世紀之後，中國大乘佛學的研究與創作，則受到西學的影響與學院工作方式的主導，而才有了種種新的面貌。本文旨在就哲學領域對中國大乘佛學的研究進行理論反省，並將以當代中國哲學家方東美教授的佛學論著為對象，討論他對大乘佛學研究的基本立場，以作為當代哲學學科對大乘佛學研究的一個理論型態之提出與檢討。

方東美先生有西洋哲學的訓練、<sup>1</sup>儒家的性格、道家的情懷與佛教的精神歸趣，可以說，他在信仰上是佛家的，雖然也有學者亦將其列入當代新儒家之林，<sup>2</sup>但以筆者的觀點，方先生有研究儒學是事實，<sup>3</sup>有提出儒學理論系統更不在話下，但說他一生哲學活動的學術定位是新儒家就未必準確了。關鍵即在，他對宋明新儒家多有批評，而他最終的宗教信仰卻是定在佛家，<sup>4</sup>他一

<sup>1</sup>參見馮滄祥先生言：「他青年時期對知識論最有興趣，對新唯實論尤其下過苦功，詹姆士、懷德海、羅素等人的著作本本精讀，終於寫成博士論文《英美新實在論之比較研究》。」參見馮滄祥（編著）。《方東美先生的哲學典型》（臺北市：臺灣學生書局，2007），26。

<sup>2</sup>參見蔣國保、余秉頤先生言：「方東美究竟是不是現代新儒家，這個問題，迄今學術界仍在爭論，一時似難以取得共識。有學者認為，方東美應該屬於廣義的現代新儒家。有的學者則認為，視方東美為現代新儒家是誤解方東美思想的性質，其實他並不是現代新儒家，而是『一位地地道道的當代新道家』（胡軍。〈方東美哲學思想的道家精神〉，《中國哲學史》，1期（2000）。引自蔣國保、余秉頤。《方東美思想研究》（天津市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04））……但我們這部論著既然是將方東美作為現代新儒家來研究，那麼我們就有責任來說明為什麼方東美堪稱當代新儒家。」參見蔣國保、余秉頤，《方東美思想研究》。

<sup>3</sup>傅佩榮教授曾說：「方先生原籍安徽桐城，家學淵源自不待言。……方先生曾說自己『三歲讀詩經，十二歲就讀完了十三經』。」參馮滄祥（編著），《方東美先生的哲學典型》，118。

<sup>4</sup>傅佩榮教授言：「最後也最難理解的是他的宗教信仰。方先生在抗戰期間，避居重慶，乃就近構取寺廟所印的華嚴經閱讀。每次空襲警報響起，他就隨手帶一本佛經躲警報，坐在防空洞靠門還有光亮的地方，專心思索經文中的道理。方先生講學留下的筆記著作中，有《中國大乘佛學》（上下冊）與《華嚴宗哲學》（上下冊），簡直像是一位佛學大師了。方先生養病期間，中期弟子劉孚坤教授曾帶他去土城拜訪廣欽老和尚。據劉教授說，方先生這一次正式皈依了佛門。但是，事後沒有人從方先生口中證實此事，而我們在方府也不曾見過佛像或任何與佛教禮拜有關的跡象。尤其因為方師母並未信仰佛教，所以也避談此事。依合理的判斷，情況如下：方先生在個人的宗教取向上，無疑是接受佛教的；不過，正如他所強調的，『佛教是亦宗教、亦哲學』，而他所接受的主要是『作為哲學的佛教』，可以啟發覺悟的智慧，看出旁通統貫而圓融一體

生最終的講學也正是結穴在佛教哲學，<sup>5</sup>說他是當代佛學家倒是比較符合事實的，因為他確實提出許多研究佛學的明確立場，形成佛教哲學化的學術貢獻，甚至有佛高於儒的言語，而他的佛學造詣，雖然沒有在當代引起廣大的重視與討論，但也仍有佛學界的重要人物對他極為肯定。<sup>6</sup>當然，方先生批判宋明新儒家卻贊同原始儒家，而對宋明新儒家的討論也是批評中帶有肯定，甚至他也討論道家，也肯定道家，並且也有學者以當代新道家定位其學思性格，<sup>7</sup>誠如他自己所說的，他追求的是學統而非道統，<sup>8</sup>儒釋道三家他都有所研究也有肯定，應該說他是學者哲學家的身分理解、介紹及發皇儒釋道三家之學的當代學人，硬要說他是當代新儒家、新道家還是新佛家的話，恐皆非其所許。

方先生的佛學造詣，可以說完全出自自學，且有一教學的目的，即是他雖在青年時期即接觸佛學，但卻是到接近晚年的時候才發為論著與教學，關鍵即是他一直謹慎地學習，視佛學為深奧的學問，又懷抱崇高的敬意，是以從不輕易發言，然而一旦發言，便展現了當代中國哲學家中最具宗教與哲學深度的成果。參見其言：

我接觸佛學的書很早，但是在我二十幾歲的時候從來不談佛學；佛學的書可以看，但是從來不談佛學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沒有這個資格，由於佛教的經典浩如煙海。……我有五年期間專門從重慶的華嚴寺買佛經來看，夜以繼日，日以繼夜的看。但是我還是不談佛學，因為在那個時候我不可能把佛教的重要經典擺在前後左右。要拿就拿，要看就看，沒有這樣便利。我到臺灣來了之後，在臺大最初的十年也不談佛學，……<sup>9</sup>關於佛學這一方面的學術，在我青年時代就開始注意。……當我在南京開始研究哲學的時候，自己也看到一些佛學書，而且也曉得它不是一門輕易可以瞭解的。……所以儘管我接觸到這些唯識學的作品，然而我卻始終不敢談佛學。一直到抗日戰爭開始，南京淪陷了，我自己的藏書也完全丟在南京，僅僅隻身逃到重慶。

---

的大千世界。借用華嚴宗的術語，是『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一切即一切』。若是證得智慧，當下解脫生死。」參馮滄祥（編著），《方東美先生的哲學典型》，124-125。

<sup>5</sup>傅佩榮教授曾說：「民國六十一年（1972）……我趕上了方東美先生在台大最後一年的課，課名是「中國大乘佛學」。」參馮滄祥（編著），《方東美先生的哲學典型》，114。後來，方先生又到輔仁大學講學，課程就包括大乘佛學與華嚴宗哲學，該課程還經學生錄音打字編輯成專書出版。

<sup>6</sup>當代著名的佛教思想傳教法師淨空和尚，就時常稱頌方東美先生，因為方先生曾為其講授佛教哲學。宛小平教授在其所著《方東美與中西哲學》書中道：「1973年74歲，……有位淨空法師想聽方先生課，方師專門在家中為他上課，後來淨空法師印行《華嚴經》50套給方東美先生，方先生又將這些送給學生。」參見宛小平。《方東美與中西哲學》（安徽省：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08），323。

<sup>7</sup>同註2。

<sup>8</sup>參見方先生言：「其實，如果有正確的道統觀念，談『道統』也未嘗不可。但是，習聞的『道統』，卻是『虛妄的道統』。所以我認為改稱『學統』比較允當些。如果要建立正確的『學統』觀念，首先必須具備有真實的歷史智慧與豐富的歷史知識，也就是司馬遷所提出的『通古今之變』。」參見方東美。《新儒家哲學十八講》（臺北市：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85，再版）。

<sup>9</sup>方東美。《中國大乘佛學·上冊》（臺北市：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05），318。